

每次攀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,我都会有一种抵达天空的虚幻感觉,双脚一下子变成翅膀似的。同时也真真切切地生发一种心满意足的自豪。我当然清楚,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这个高度上踩碎了白云,可我仍然要炫耀一番:这时候你平视四周,比站在地面仰望天空,似乎更高、更空、更深。是存在的空,是大中的小,惟我真的还是我自己。这时我多么想把自己揉进云里去!我俯瞰青藏公路,每一辆行驶的汽车都变成了蠕动的黑甲虫。我突然觉得太阳像一枚正在渗油的蛋黄,正穿破云层在吃力地下降、移动。我好紧张,太阳分明与我只隔着一朵云,我伸手就能撕下一片阳光装进衣兜。不知什么时候我乘坐太阳云果然降落在了一座桥上——其实我一直就站在桥上,这里的海拔是高,但是我明白主要还不是脚下的高度,而是精神上的。如果你不是精神上向远方眺望,即使真的到了太空,仍然看不远。

楚玛尔河公路桥,长江源头第一桥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河是重复的,桥也如此。和它近在咫尺的沱沱河桥,被人们誉为江源姊妹桥。楚玛尔河是藏语,意为红水河。“红水”的含义,吉祥如意的佛语。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相信,从这两条河的浪涛里舀一勺水,会把我们浑身洗涤得比干净还要纯洁。

新世纪之初一个刚刚复苏的春天,我驱车去拉萨途中,特地缩短了跋涉的路程,在楚玛尔河停留三天,解读这座桥。一个时代的到来,都续写出上一个时代的新篇。桥头的斜坡上有一块削磨得光滑平整的石头,上面用红漆刷写着“限速40公里,海拔4460米”。我踩着桥面不咯脚的石子走了几个来回,又钻进桥洞看了看,既关照它通体的阳光,也察看挤在它石缝间日渐枯萎的老草。我在桥上站着,不时总有汽车碾过,车轮下的桥面像一幅油画布,卷起又展开。砌在桥上的石子发出悦耳或刺心的响声,它们组成的交响曲,化解了我因为缺氧给身体带来的负担,使我的生命更加坚固起来。

我的心在清亮的流水里颤抖,轻轻激荡。如果我不能把几十年间我亲历的这桥今天的伟岸与昔日的简陋,展现给未到过青藏高原的朋友,那么就枉跑了上百次世界屋脊。于是,我走上桥头的一座山包,轻声地告诉远方的同志,也告诉太阳:谁拥有楚玛尔河的浪涛,谁就是有源头的人!

我有意和桥拉开适当的距离,在桥头找了一个可以通览大桥全景的位置,站静,细嚼。

我的心情异常放松,有一种享受生活的难以言表的舒畅。每个人都有被幸福陶醉的时候,在缺氧的高原也不例外。岸上的草坡刚刚披上茸茸衣裳,瘦了一个冬天的河水也开始变肥,好像躲在太阳里哗啦啦的涛声把我浑身冲洗得酥酥的畅爽。河水清亮找不到一点发脾气模样。我双手背在身后,像农民用脚步丈量地亩一样,从桥头起步到桥那头。我观赏大桥的壮美,找寻创作灵感的触发点。我看到草原和群峰朝远处退去,楚玛尔河从中间流来。远处的河在高处不可涉,更远处的山峰挂在佛古拉山不可登!从站在桥上那一刻开始,我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。这座崭新的公路桥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,更显得宏伟、壮美。平日,不管到了什么地方,我总觉得自己的目光和思维有太多的限度,可是站在楚玛尔河大桥上,我顿觉心眼宽阔。因了这座桥,楚玛尔河更像楚玛尔河了!也因为有了这座桥,我们可以看到更远方的远方了!

我踏步估量桥长约200多米,加上两头的引桥,长度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。桥面结实宽坦,并行两台汽车也互不干扰。齐至我腰的护栏像窗棂一样规整透亮。八根水泥浇灌的桥柱,双人合抱也难以并接手指,它们安然稳定地挺立于激流里。残留在立柱上面流水浸过的粘着草屑的印迹,说明也许在昨夜激流冲刷过它。大地再倾斜多少度,河流再下滑多少深,这座桥都这样不动声色地站立着!因为那桥墩里面睡着一个修桥架桥士兵的身躯……

楚玛尔河公路桥从1954年通车至今,不含修修补补的“小手术”,有记载的大规模改建扩建共四次,每次工程都镌刻着时代变迁的印迹。老的皱纹被蒸腾而上的朝霞淹没。修桥的战士注定是刷新高原面貌的赶路人,江源的冻雪还凝在眉梢,羌塘的寒风又落满了他们的行囊。生活总是被他们点亮,再点亮,而他们一直在凛冽冷雪的深夜苦战。楚玛尔河位居被人们称为“生命禁区”的世界屋脊中心地带,年平均气温零下6摄氏度,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。人空着手走路犹如在平原身负50斤的重量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年初夏,修建楚玛尔河公路桥的一支部队,顶风含雪驻扎河边,在桥头一块

写下这三个字的题目,我的心一阵发紧,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饥饿的年代。

我不知道“边外”一词是不是方言,也不知道没怎么受过饥饿考验的城里人,是否懂得这个词的深层含义。至于边外究竟在哪里?具体指的是哪个方位?我自小就很模糊,甚至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真正搞清楚过。想来就是泛指黑龙江省,连带毗连黑龙江的吉林省部分地区,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靠近东北的部分地区,方言以黑龙江为主连带毗连区的近似黑龙江方言。如果一定要确切一些,那么我的脑海中总是涌现出北大荒的广袤黑土地。地理老师教过我:棒打狍子瓢舀鱼,野鸡飞到饭碗里。这就是课本里的北大荒,“地大物博,物产丰富”。1970年代,没有一个人会对课本提出质疑。

当时,在辽南乡下,我们面临的现状是:家家的口粮都不够吃,生产队的一个工分仅值一毛钱(至少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如此)。一年下来,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劳动力,一结算,还倒挂,也就是不但没挣到钱,还欠生产队。家家的饭桌上,我们总能看到玉米面饼子、玉米粥、地瓜等,这是主食;菜一般就是一钵子熬酸菜,顶多加上一碟腌渍的萝卜瓜子。一日三餐,天天如此。这样的饮食,谈何营养?能填饱肚子,就是



楚玛尔河的生命里程

□王宗仁

裸露着冰渣的地上撑起了军用帐篷。凛冽的暴风雪怒吼着卷起砂石像一匹野马,肆无忌惮地从空旷的可可西里迅猛而来,沿着楚玛尔河漫无边际地狂奔而去。白天战士们施工时狂风、野寒来添乱,夜里兵们加班它照样偷营工地。工地上没有消停的日子。那几顶用粗壮的铆钉楔入冻土地固定着的军用帐篷,虽然一直在狂风里东摇西晃,却并不随风离地。环境恶劣只是其一。部队的施工设备和技术还没有完全摆脱肩扛臂拉的重体力劳动,几台推土机和几十台自卸车,外加铁锹、洋镐、小推车和扁担竹筐什么的,都是官兵们必不可少的“常规武器”：“一双手和一条命,自力更生样样行!”

江河源头的暴风雪,千多年来一直那么放肆地暴虐着,千年后也许仍然不会收敛它的蛮横,甚至有时还要陡野三分。不必惧怕。桥梁工地上的火烫炽热准能冶炼它。这是一年中仅有的两个月无霜期,施工的黄金时段,冷月寒星当灯盏,雪花飞舞催人暖。曾记得为了竖起一台钻机架,全连百十号官兵轮番出征。凭体力拼,当然也有智慧巧取。兵们手拉手站在齐腰深的河浪里,围成人墙拦截激流。冰冷的河面落满汗滴,热汗与冰渣相融交汇,河面盛满了暖色。河水以一种新的姿势流淌。高高竖起来的机架,是支撑世界屋脊的擎天柱。兵们的呼吸随着河浪起伏。

恶浪峰上颠,险涡波中埋。

凡是在高原生活过的人,待的时间越久,尤其身负艰辛的任务后,越有一种爱莫能助的虚虚实实的恍惚感,不知道这一刻活着下一刻还能不能呼吸高原缺氧的空气。生命的真实价值就在于每一刻都力争让它抵达精神的霞光。入伍刚满三年的小裴那天晚上加班浇灌混凝土桥桩前,在他战友把写给妻子的信次日发往家乡时,绝对是对自己的明天充满信心翼翼的渴求。要不他不会主动请缨去执行最艰巨且危险的浇灌水泥桩任务。无情的事实却是,深夜残酷的奇寒冻得他四肢僵冷,体力实在不支,瞬间就滑落到几十米深的水泥桩里,一个年轻如鲜花怒放的生命就这样凝固在了楚玛尔河的大桥上。让人痛心的是,七天后他妻子来到工地安顿他的后事时,拿出那封信竟是一封遗书。信上说,他愧对妻子和家人,他知道自己是在高原执行施工任务,说不定哪一天就献出了生命。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,他嘱咐妻子不要保留自己的遗体,就同这封遗书一起掩埋在楚玛尔河畔。不立墓碑,也不用写碑文,只舀一勺源头活水浇在坟头坚固他的墓地。妻子和战友按照小裴的遗愿这样做了。小裴虽然没有坟墓,也没有墓碑,但他的死大作了生!

我驻足楚玛尔河的那天,心头的情感五味杂陈。我在那根桥柱和掩埋小裴遗书的结着一层冰渣的地上,来来回回地走了不知多少遍,反反复复地想了想。心情很复杂,但“复杂”二字似乎又很难真实地反映我的情感。确切地说,我心里只剩下了疼引发的爱。他还来不及享受爱情的幸福,就把无限的疼痛留给了一个姑娘。舍不得这根被小裴生命灌注的桥柱,我对桥柱声嘶力竭地连喊三声:小裴,你醒来!醒来吧!

嗓子都挣出血了,却没有任何回应,只听到楚玛尔河的浪涛拍打桥柱的声音。我终于难以抑制自己对往事的回忆,想起了曾经的那座桥,楚玛尔河上那座最初的“木头笼子”桥,用此来抚慰我疼痛的心……

那是1959年的一个中午,炽白的太阳挂在中天仿佛不散发任何热量。我们的汽车翻过昆仑山驶入可可西里莽原不久,车队停在一条河边。那条河仿佛从天畔奔腾而来,明晃晃的一条飞浪越飞越宽,不可控制的来势。最后流到这座桥前。桥架在一处平缓的地方,水势略有变慢。桥头的崖畔半埋半露着一块毛茬茬的、劈得很不规则的长方形石头,上面写着“楚玛尔河,限速10公里”,字迹有点儿歪斜,“玛”字还少写了“王”字旁,显然是临时应对,太匆忙。乍看那块似乎悬在空中的石头,随时都会掉下来。其实不会,它的根基很深,下面有楚玛尔河的流水牵着。当时青藏公路通车不久,可以理解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桥的模样,那也算桥吗?浑身上下全姓木:桥栏是木板一块挨一块地钉固起来,桥面是木板和圆木混杂铺就。桥柱呢,是好几根木柱用铁丝捆绑在一起合成的,中间的空心处填满了石子。立柱和立柱之间用或直或斜的木板牵着。暴露在外面的那些不算少的“Π”形铆钉显得力不从心的吃力。奇怪的是,桥面的那一根根圆木或木板并没有钉子固定,都是活动的。汽车从桥上通过时,桥体的各部位都发出很不情愿的吱吱嘎嘎的叫声。好像随时都会连人带车翻到河里。我提心吊胆地坐在驾驶室理想,它难以承受重载,太需要一根拐杖支撑着它了!我们的车队过桥前,每台车都卸掉了车上承载的部分物资,以减轻桥的承受力。过了桥又把卸下的物资装上。

那天我们过楚玛尔河时,有一个难忘的镜头至今留在记忆里:在离桥约百十米的河面上,有一大群藏羚羊正津津有味地扎着头喝水,瞧那美气劲巴不得把整个一条河吸到肚里去。我们的汽车过桥,压得桥吱吱乱叫,也没有惊动它们,只是一边喝水一边不时地仰起脖子望望我们。我特地放慢了车速,分明听见了它们砸着水面那吱儿吱儿甜蜜的声音。随后我们的车队过了桥加速赶路了,长鸣车笛,它们才一齐长嘶狂叫地发出尖刺的声音,许是给我们道别吧!从那次以后,我再没看到藏羚羊和我们汽车兵和平共处的情景了。

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楚玛尔河。没有给它装饰笑容,也未见到壮丽场景。它似乎没有下跪的姿势,我们也不必仰望。一切原汁原味。唐古拉山和楚玛尔河,是青藏高原上两种不同的高度,因为有了唐古拉山,楚玛尔河才流得更像一条河;因为有了楚玛尔河,唐古拉山就挺立得更像一座山。两种不同的高度,两种雪域风光!其后,我又多次途经楚玛尔河,尤其在我当驾驶员的那三年里,每年都少不了十次八次走楚玛尔河。每次我都会寻找这座桥留下来的和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生命痕迹。我知道,只有不断地消失,一切美好的才会留下。只有不断地消失,楚玛尔河的生命里程才会像静夜里落在它怀抱里的夜明星一样晶莹,闪亮!

大荒。不为别的,只为能吃一口饱饭。这些人,被屯子里的人统统称为“跑边外”。

那时那地,“跑”并不是一个褒义词,跑边外跟“跑盲流”、“跑破鞋”等词语并列在一起,使这个词有了些许揶揄的味道,但其中的无奈,当时生活在乡下的人,都不难体会。

姥娘家的邻居三姥爷家,儿女五六个,穷得没办法,三姥爷带着小女儿跑边外投亲去了,三姥爷领着剩下的几个孩子在这边过。三姥爷在边外吃得穿上穿上,苦了家里的儿女,没妈的孩子像根草,稀里糊涂地生长。数年之后,三姥爷无奈,只好写信求三姥爷回来。三姥爷勉强地回来了,相继长大的儿女,跟多年不见的妈妈难免隔阂。三姥爷的口音变了,说一口北边的方言,我们当地爱落地称之为“说偏”。三姥爷已经习惯了边外的生活,三姥爷习惯吃大米饭,还学会了抽烟,这一切让这边的儿女感到陌生。没几年,三姥爷去世了,三姥爷悻悻地带着小女儿再度奔往北大荒。

改革开放以后,跑边外的人们大都“倦鸟归巢”,他们带着口音回来了,他们带着边外的妻子儿女回来了,有的甚至可谓衣锦还乡。更重要的是,边外的人们开始成批量、成建制地涌向辽南,涌进大连,成为这个浪漫城市的新市民。

14年前,我第一次随年逾花甲的妈妈一起去往她的老家,浙江省衢州市小湖南镇坑头村,妈妈和她的三个哥哥三个姐姐的出生地。村子坐落在郁郁葱葱、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,在碧蓝如洗、鱼翔浅底的乌溪江畔。我们在桃花源一样的小路上盘旋,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屋。这是一座已逾百年的浙西风格的老房子,因已久不住人,檐下结满了蛛丝儿,吱吱呀呀的大门依稀可见昔日的朱红,高高的窗棂雕着已然斑驳却依然精美的图案和花纹。

很久以前,外公的爷爷从福建迁徙到这里。这里有一山青翠茂密的毛竹,还有一江清澈见底的溪水,正是造纸的好地方,祖上造纸的生意做得很大,而且乐善好施,很快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,一座流传百年的大屋也造了起来。房子建在半山坡上,面朝猫屋山,背靠卧虎山,出门就是满目青翠的毛竹。尽管是生意人起家,但张家人祖祖辈辈崇尚读书,世代书香,到了外公这一辈,更是以教书为业。整个家族还积极投身革命,战争年代,张家大门上满满地挂了七个“军属光荣”的牌子。

妈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年长妈妈17岁的二姨像个“小妈妈”似的照料着妈妈。妈妈3岁那年,一顶大红花轿把新娘子二姨抬到了衢州城里,妈妈哭喊着拼命追赶那顶大红花轿,追呀追一直追到了小村外。那个伤心欲绝的场景,那声声泣血的哀号,妈妈记了一辈子,也念了一辈子。

那时,二舅三舅在外读书,后来二舅去了朝鲜战场,再后来考上了河南大学,三舅和三舅妈双双考上了同济大学,大舅在家务农,和不着稼穡的外公一起艰难地挑起了养家的重担。

妈妈在村里的小学读书,9岁时外婆因病去世。妈妈后来考上了衢州最好的中学衢州二中,重新来到了二姨的身边。

那时,二姨的日子十分艰难。原本二姨嫁的是衢州城里的殷实之家,二姨父有着十分出色的生意头脑,不想后来却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发配边疆,不仅染上了肺病,脾气也变得乖张阴戾。二姨不得不靠替人缝补裁剪衣裳勉强度日,长子未及成年便不得不离家自谋生路,二儿子过继给了大舅,小儿子跟着叔叔过活,只有最小的女儿跟着二姨过活。

即便日子如此困苦艰难,捉襟见肘,二姨还是为妈妈俭省出了吃的、穿的、铺的、盖的,每当周末妈妈来到二姨的小屋时,二姨总是变戏法一样为妈妈“变”出难得的美味和好看的衣裳。那时的衢州,因了二姨的存在,就是妈妈温暖的家,就是天堂一样的美好。在自幼丧母的妈妈的心里,二姨就好比她的妈妈一样亲,一样近。大学毕业后,妈妈被分配到千里之外的河南南阳,从此离开浙江,和家乡、二姨远隔千山万水。

30多年后,当彼此的生活都渐有起色,亲如母女的两姊妹才开始了车马走动。1996年春,二姨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来到河南南阳,看望她的小妹,我的妈妈。70多岁的二姨一边和妈妈说话,一边“宝刀不老”地“重操旧业”,脚踩着缝纫机一口气为妈妈赶做了十几双鞋垫。二姨慈爱地看着她那已过五旬的小妹,仿佛小妹还偎在她的怀里,缠着她让她梳小辫;还是那个盼着过周末,盼着到她的小屋里去一饱口福的惹人怜惜的小妹妹。

南阳到衢州相距迢迢2000里,不通航班,没有轮船,火车也不能直达,所以后来即便没了盘缠资费的窘迫,姐妹两人的相见,亦仍是难上加难。

2003年夏,妈妈第一次带着我回乡探亲,那一年是二姨的八十大寿。历经艰辛的二姨如风中一从柔韧的芦苇,终于迎来了,四世同堂,儿孙绕膝。二姨的八十寿宴也是张家众兄弟姊妹最团圆的一次聚会。

那次回乡探亲,妈妈带着我照例住在二姨那间住了大半辈子、给妈妈带来许多美好时光和温暖回忆的小屋。妈妈和二姨挤在一张床上睡,每晚都要挨在一起唧唧呀呀说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,直说到很晚很晚。那间小屋逼仄狭窄,依旧是水泥地、白粉墙,依旧是老桌椅、木板凳,老式水笼头里,流出的依旧是滴答、滴答的水滴声。那间小屋,也依旧是妈妈眼里心里念念不忘的温暖的家,是天堂一样的美好。

上了年纪以后,妈妈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,还曾突发过脑梗塞,因此凡出远门必慎之又慎,而且必得有人作陪,能不出门的,就一律都省了。

去年春,妈妈提出要再回趟老家,我们坚决反对,因为前年她和爸爸从老家回来后因劳累和颠簸身体虚弱手脸浮肿。可是一向温声柔忍的妈妈竟去意已决,对我们的一再反对要么沉默不语,要么就一句话“我要回家”。对峙了好长一段时间,终究是拗不过她,去年五一,由我陪着妈妈再次回到老家。

这次回老家,衢州城变得越来越美,屋舍俨然,街衢灿影。可是,二姨的小屋已消失不见了。小屋被拆,二姨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,不得不住进了养老院。为了让二姨和妈妈这两个老姊妹再度团圆,家人把二姨接到了小表哥的家里。

我们推着轮椅,轮椅上坐着93岁的二姨,一起再访祖屋。在祖屋,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,恍然若梦。又继续上行,虔诚跪拜了才刚重修的仙姑庙,那护佑着子孙仙寿恒昌的家庙。

归去途中,路遇一位80多岁的老翁拉着满满一车柴,爽朗地和我们打过招呼,便脚步轻快地疾行下山去了。在山里,绿水青山依旧,茂林修竹仍在,鹤发童颜皆是,可是白云生处的人家,却大都换作了高梁大瓦,祖屋是极少见的了。住在别墅,有开满山坡的菊花、紫苏、鱼腥草、金银花、马兰头环绕,有美味的清蒸跳跳鱼、竹笋炖山鸡饕餮,可我们还是想往那陋室空空、衰草枯杨的百年祖屋,因为那里有着从前的日子、从前的慢。

从前的日子,从前的慢,从前的青春和芳华,如流水一去不返。“一切都是瞬息,一切都将会过去;而那过去了的,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。”诗人普希金,用诗写下永远,写下怀念。

妈妈说,这可能是她和二姨此生最后一次相见了。山居几日,城堡的表哥们一来到村里,他们从山上砍下背回一根根长长的毛竹。原来,他们是在为二姨造墓。二姨说,百年后她要葬在老家的山上,她的墓,要紧挨着大舅,正对着外公外婆,要遥遥望着她生长大的祖屋。在另一个世界,她要天天守着她们的父母,守着她的家。

那次见面,竟真的成了永别。

跑边外

□李皓

一家人最大的奢求。如果家里人口多,青黄不接的时候,饿肚子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饭吃不饱,又没有额外的收入,男孩子长大了成家立业自然就成了问题——一系列的生存窘境摆在乡人的面前。

那个年代的人,脑子都不怎么活泛,或者说基于一些僵硬的管理模式,人们即使受穷,也是心甘情愿,故土难离。但是,当人真的走投无路或者面对无法克服的困难时,人的能动性会瞬间被激活。首先,他们要向能吃饱的地方去。但是,在集体经济为主导的年月,必须投亲靠友才行。人们通常会想到“到处都是大豆高粱”的北大荒,那里地广人稀,有的是粮食。然后再想一想有没有直系亲属在当地,或者是偏亲,即使是当年闯关东走散的亲戚,只要能联络上,在那里有个照应就成。

于是,有的人家一个儿子去了,有的人家一个女儿去了,有决绝的,干脆举家奔向未知的北



團
結
湖

秋塘老屋图

孙君良作